

黃俊傑 全球化時代的大學通識教育與文化傳承

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 一卷三期

2008 年 1 月，頁 1~14



# 全球化時代的大學通識教育與文化傳承：問題與方向

黃俊傑\*

(收稿日期 2007 年 8 月 8 日；接受刊登日期 2008 年 1 月 31 日)

## 摘要

本文論述全球化時代大學通識教育之文化角色，指出全球化趨勢所造成的問題，並分析大學通識教育的新方向。本文第一節首先分析全球化趨勢加強了居於全球化中心位置的國家對邊陲國家的控制，也拉大了貧富的鴻溝。本文第二節接著指出，全球化及科技的新發展，改變了大學的結構與價值觀。因應這種趨勢，大學必須一方面傳承普世價值，一方面又保存並弘揚民族文化。

本文第三節分析大學作為文化傳承之載體，必須在所有專業課程中都融入人文關懷，並採取溶滲式教學方法開授課程。本文第四節則進一步探討落實文化傳承的通識教育理念與課程規劃方案。本文第五節則綜合全文論點提出結論，主張以承擔文化責任重建大學之理念。

**關鍵詞：**全球化、大學理念、文化傳承、互為主體性

---

\* 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名譽理事長；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Email: cc10.huang@msa.hinet.net；Website: <http://huang.cc.ntu.edu.tw>

## 壹、引言

在 21 世紀全球化加速發展，大學面臨諸多挑戰的新時代裡，大學通識教育與文化傳承的關係這個問題特別值得深入思考。這個問題涉及面向甚多，相關議題甚為複雜，我們可以從全球化趨勢以及對大學的衝擊切入思考。

所謂「全球化」是二次大戰以後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趨勢。在許多亞洲國家的知識界與政界領袖對「全球化」的榮景不勝嚮往，許多人熱烈歡呼地球村的來臨之際，我們要特別重視「全球化」發展趨勢所具有許多負面影響，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全球化」加強了中心國家對於邊陲國家進一步的宰制。當代美國語言學家杭士基（Noam Chomsky, 1928 - ）不僅在專業領域有劃時代的貢獻，同時也是一個有良心的知識份子。杭士基在專業研究之餘寫了許多書批判他自己的祖國美國，非常像前蘇聯時期，曾經獲得列寧獎章的科學家沙卡洛夫（Andrey Dmitriyevich Sakharov, 1921 - 1989），對於共產黨所展現的批判。杭士基在 2000 年出版的《流氓國家》（*Rogue States*）一書中談到，在「全球化」趨勢下，其實世界上並沒有所謂的七大工業國（G7）、八大工業國（G8），而是只有一個 G1，就是美國。<sup>1</sup>美國就是杭士基所說的「流氓國家」，「全球化」的趨勢使得居於「全球化」中心位置的國家日漸流氓化。我們觀察布希政府攻打伊拉克，侵略阿富汗等帝國主義者的行徑，都可以顯示杭士基批判之深刻。

「全球化」的趨勢在國內以及國際脈絡都加深了貧富的鴻溝。就國際脈絡而言，「全球化」發展導致了富國與強國更加無止盡地宰制弱國與窮國，而窮國別無選擇，必需向國際貨幣基金（IMF）或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機構貸款，因此更加貧窮。這些事實都應該讓亞洲知識份子對「全球化」有更進一步的思考。至於在國內脈絡也是如此。我們看到世

---

<sup>1</sup> 杭士基（Noam Chomsky）著，林祐聖 譯，《流氓國家》（*Rogue States*）（台北：正中書局，2002）。

界各國一些熱門科系的學生，畢業以後大概前十年或前五年，就累積了可觀的個人財富；同時我們卻也看到各國國內大量失業失業者走上自殺的絕路。2006年12月5日位於芬蘭首都赫爾辛基的聯合國大學世界發展經濟學研究所（UNU-WIDER）發布調查報告指出：公元2000年，全世界最富裕的1%成年人口擁有全球40%資產，而最富裕的10%人口則擁有全球85%資產。全球財富大量集中在北美、歐洲和收入水準高的亞太國家，居住在這些地區的人擁有全球近90%的財富。其中北美人口只佔全世界6%，卻擁有全球34%財富。<sup>2</sup>這種貧富鴻溝的巨大撕裂誠然令人怵目驚心。

在「全球化」大潮流趨勢之下，台灣與大陸的大學院校正處於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上。所謂的「歷史十字路口」，誠如美國加州大學前任總校長柯爾（Clark Kerr, 1911 – 2003）所說，就是指大學受到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與國家化（nationalization）這兩大力量的拉扯。<sup>3</sup>在「全球化」衝擊之下，各國的大學必須自願或非自願地捲入「全球化」的潮流。耶魯大學現任校長雷文（Richard C. Levin, 1947 – ）上任以後，最重要的辦學理念就是把耶魯大學轉化為一個「全球化」的大學。他設立了「耶魯『全球化』研究中心」（Yal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ization），延請耶魯經濟系的校友，尋求連任失敗的墨西哥前任總統賽迪洛（Ernesto Zedillo, 1951 – ）來擔任中心主任，並利用他的關係請到了包括聯合國前任秘書長安南（Kofi Atta Annan, 1938 – ）等政商名流到耶魯交流演講，同時設立專門網站，也與中國大陸教育部合作，辦理大學領導培訓班。<sup>4</sup>

台灣的大學也必須面對與日俱增的國際化壓力，隨著教育部五年五百億「邁向頂尖大學」的專案計畫，十二所頂尖大學所承擔的壓力十分

---

<sup>2</sup> 請參考下列網址：<http://www.wider.unu.edu/newsletter/newsletter.htm>

<sup>3</sup> Clark Kerr et al., *Higher Education Cannot Escape History: Issu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sup>4</sup> 請參考以下網址：<http://www.ycsg.yale.edu>

沉重。每年教育部都要這十二所大學提報，評鑑除外文系課程之外，有多少課程用英語講授。當代非英語知識份子實際上是生活在英語霸權之下，這就是國際化的一個效應。處於「全球化」潮流之下的各國大學，面臨「國際化」與「國家化」間的拉扯，具體表現在大學教育中的，就是普世價值的傳播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之間的拉扯，尤其以「公民教育」這個教學領域最為鮮明。公民教育之所以成為意識形態諸神的戰場，乃是由於現代世界所謂的「普世價值」，都是源自近三百年來西方國家具體而特殊的經驗，由西方的霸權國家擴張到全球。舉例來說，許多大學院校都開設「憲法與立國精神」這門公民教育課程，然而講授內容多半是出於歐陸思想大師以及美國開國元勳，根據其自身歷史經驗而發展出的理論內涵，揆諸海峽兩岸憲法的具體條文，恐怕在價值理念與社會政治現實各方面，都有相當落差，所以大學教育內容所傳授的「普世價值」與大學的「地域特性」之間，就難免出現緊張性。

「全球化」趨勢是所有的大學都必須面對的，然而到底大學教育應國際化或國家化、追求普世的或地域的價值觀、為資本主義服務或是挺立大學的社會良心，這些都是大學在這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所必須面臨的選擇。作為大學教育之基礎的大學通識教育一定要注重文化傳承，這是大學教育的責任。但是我們要問：大學通識教育做為文化傳承載體的理由在哪裡？如果放棄文化傳承的責任，我們的大學會如何？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就可以進一步討論通識教育的課程規劃與教學實務問題。

## 貳、全球化趨勢、科技發展與大學的文化傳承責任

如上所述，在「全球化」趨勢的榮景之下存在許多陰暗面，從亞洲知識份子的立場來看，首先要注意世界各地多元多樣的價值體系在「全球化」潮流之下的趨同化。在上世紀末，美國東岸一些右派、保守的學者，比如說管理學大師大前研一等人的諸多著作固然透露出博雅與睿智，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著作中常常為新的既得利益國家與階

級背書。福山（Francis Fukuyama, 1952 - ）說人類的歷史已經結束了，我們都是最後一個人，人類的歷史的終結就是資本主義與民主政治的勝利。<sup>5</sup>價值的趨同化是一個「全球化」所帶來的效應。舉例言之，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中國大陸，處處向「錢」看，資本主義價值觀在大陸的快速普及，這個現象值得我們注意。

其次，語言的趨同化是「全球化」下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語言學家估計，在今天人類所使用大約六千八百種的口頭語言中，有 50-90% 將在二十一世紀滅絕；而且全世界的語言平均以每兩週一種的速度在消失。有幾個歷史因素造成語言多樣性的消失：第一個是三百年來殖民主義的浪潮，殖民主義是滅絕語言頭號殺手；第二個是民族國家的興起，民族國家建立了國民的語言政策；第三是工業化；第四個殺手是國際化以及最近幾十年來風起雲湧的現代化。

語言多樣性滅絕的後果頗為嚴重。就個人微觀的層次來說，語言的創造能力流失了；在比較宏觀的立場上，則是文化的多元主義消失了。語言多樣性是界於文化多樣性和生物多樣性之間的一個平台，1992 年在里約熱內盧舉行地球高峰會之後，生物多樣性的議題開始受到重視。但語言的多樣性的保存與發展卻也是「全球化」時代中非常嚴峻的挑戰。展望未來，也許兩百年之後全世界只有兩個最重要語言：英語與漢語。其中英語已經是全球學術界的霸權語言。亞洲國家那些最優秀的年青人，也就是社會蛋糕的上層乳酪階級的後備部隊，從十八歲進入了工學院、醫學院、電機學院以後，他的工作語言基本上是英語，母語則是他的生活語言。此外，在二十世紀以前，漢語也是東亞各國的共通語言。例如柏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 - 1858）將軍率領的美國軍艦打開了鎖國的德川幕府（1600 - 1868）之後，日本與美國所簽的第一個條

---

<sup>5</sup>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約就是用漢語所寫，具體反應 20 世紀以前漢字文化在亞洲的霸權地位。隨著中國的崛起，漢語在二十一世紀的重要性與日俱增。

「全球化」趨勢下的科技發展也帶來了**大學結構的轉變**。依據教育部的資料，不含軍警院校，台灣已有 163 所公私立的大學院校，其中包括專科學校 16 所，技術學院 50 所，大學 97 所。就教學的內容來看，一般大學佔 43%，科技就業導向的學校有 57%。<sup>6</sup>可是進一步觀察，就以台灣大學為例，文學院學生只佔總數的 9.3%。現在大學的結構已經與二十世紀初年大不相同了。

我們再來看看大學結構顛覆所造成價值觀的轉變。教育部用五年五百億計畫補助十二個頂尖大學，其考評指標如下，一：針對高科技領域相關產業人才的培養。二：刊登於 *Science*、*Nature* 等國際 SCI 等級期刊的論文總數。三：延攬國外傑出教師。四：增加與國內外大學或學術研究機構進行的實質合作數。五：進行產學合作。在上述指標考評壓力之下，各大學都有創新育成中心，把教師研發的知識與產業界聯結，讓廠商進駐，把研究成果商品化。相對而言，在許多大學領導人心目中，文學、歷史、哲學等單位基上是學校的肥料性質的系所。就是在這樣一種嚴峻的客觀形勢下，大學結構被顛覆、大學的價值被轉變。在這樣的客觀事實上來討論大學文化傳承，自有它非常重要的意義。

首先，大學教育必須要傳承並弘揚「普世價值」。「普世價值」不只是指近三百年來起源於西方而推廣至全球的價值理念；更是指工業革命以來，由科技主導文化發展所產生的諸多問題，我們在因應科技發展這個問題時所秉持的態度。舉例言之，我們必要探討並彰顯現代科技發展所依憑的深厚的人文內涵。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對西方現代科技存有諸多誤解。其中一種誤解，就是認為東方（特別是中國）文明是精神文明，而西方是物質文明；歐美是物慾橫流，東方則是天理流行。日本自

---

6

[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STATISTICS/EDU7220001/data/serial/u.xls?UNITID=139& CATEGORYID=260&FILEID=130550&open](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STATISTICS/EDU7220001/data/serial/u.xls?UNITID=139& CATEGORYID=260&FILEID=130550&open)

從 19 世紀佐久間象山（1811 – 1864）以來一直流傳著「東洋道德西洋藝」的說法，中國從梁漱溟（1893 – 1988）發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以後，這種說法也相當普遍為人所接受。<sup>7</sup>這種說法其實頗有問題。近代科技如果沒有深刻的人文內涵，怎麼有可能有最近二百年來這樣飛躍的發展？今天的大學教育傳承普世價值，對於「科技的人文精神基礎」這個問題應特別注意。

從另一方面來說，科技發展也創造了許多人文社會的問題，例如極具爭議的幹細胞複製，以及環境破壞的問題等等。此外，我們也應該注意科技與政治日益密切的關係。當代德國思想家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 – ）曾指出：雖然科學是講真理、技術是講應用的，但科學與技術到二戰以後有日益掛勾的趨勢；他進一步談到：科技政策的成功是新時代政權合法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sup>8</sup>這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科技的傑出領導人常常就是政權的分享者，這是大學在傳承「科技的人文精神基礎」這項普世價值時，所必須注意的另一個問題。

其次，大學在全球化時代中，更應致力於保存並弘揚民族文化的傳統及其價值理念。正如本文第三節所說，全球化造成了加速發展的語言的趨同化與文化的趨同化，使居於「全球化」之邊陲地位的國家與弱勢民族的文化傳承面臨滅絕的險境。因應這種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大學更應該成為各個民族文化的保存場合，培育新時代的大學生，使他們成為植根於民族文化傳統，有本有源的新時代知識份子。

### 參、大學作為文化傳承的載體：理由與管道

那麼，大學為什麼必須成為一個文化傳承的載體呢？它的理由在哪裡？從大學的功能來看，大學之所以存在的理由，是為了文化的永續發

---

<sup>7</sup> 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2）。

<sup>8</sup> Jürgen Habermas,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70)；李黎等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北京：學林出版社，1999）。

展。大學如果不是爲了文化價值理念的傳承，大學存在理由恐怕就大爲削弱。如果大學不踐履文化傳承的責任，那麼大學就和職業訓練所毫無差別。

二十世紀義大利共黨領袖之一、傑出的知識份子與思想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 – 1937）曾被法西斯政府抓去坐牢，他在獄中寫了很多手記，後來彙集成《獄中劄記》出版，其中就有文章批判當時右派政府的教育政策。他說右派政府把教育分成兩種：一種是職業學校、一種是古典學校。古典學校教的是希臘文、拉丁文，如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人的作品，從古典學校畢業的人，將來要成爲社會的統治階級；一般的人則就讀科技大學或職業學院，這一種人都處於被統治者的階級。葛蘭西批評說，這種二分法根本是錯誤的，因爲忽略了人性的尊嚴。葛蘭西主張社會應該要培養 “Organic intellectual” – 有機的知識份子。<sup>9</sup>他在書裡沒有進一步探討政府在教育中的角色，但是 20 世紀美國經濟學家佛里曼（Milton Friedman, 1912 – 2006）卻有所發揮。<sup>10</sup>佛里曼堅持政府部門應該要從教育市場完全退出，讓市場自由決定教育內容，也就是說讓家長與學生有更多選擇的權利。這種「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確有其說服力，但是事實上，這種理論會使得資產階級或社會上的既得利益階級獲得更多複製該階級的機會。舉例言之，在推甄入學制度實施後的台灣，現在經由推甄管道進入名校的優秀學生，幾乎全是社會上層階級的子女，而廣大農工階級的子弟，進入一流學府的機會就相對渺茫。因此我們看到，進入技職體系就讀的學生，多半是家庭狀況比較窮苦的學生；進入頂尖大學的學生家境多半比較富裕。如此一

---

<sup>9</sup> 參看葛蘭西的文選：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10-1920*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0);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6);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Cultural Writing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sup>10</sup> Milton Friedman, *Free to Choose: A Personal Statement* (New York: Harcourt Trade Publishers, 1980).



來，大學就背離了追求社會正義的理想。因此，我們可以說，大學如果不踐履文化傳承的責任，那就和職業學校完全沒有差別。

那麼，大學要如何踐履文化傳承這個重大責任呢？我的建議是：大學所有院系的專業課程，都應該與人文關懷的主題融合。大學部的通識教育則是最重要的管道。這個管道應如何改進以臻於完善呢？就教師的立場來說，課程結構與教學內容的調整應該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們的課程應該是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導向的，而不是記憶導向的課程。所謂的「批判」是指獨立思考、分析、判斷的能力，然而「批判思考」恐怕很難通過課程來教導。有些學校開設《批判思考》的課程，但是得到那兩學分以後，學生未必就變得有能力批判思考。「批判思考」是種思考方法或態度，藉由帶領學生思考深刻的問題，讓學生深入閱讀經過時間考驗的作品，而在教學過程當中，教師的責任非常重要。只有加入「批判思考」的因素，我們的教學才能夠回歸人的本身，而非只著重於技術性的知識傳授和商業利益。

大學實踐文化傳承的第二個管道是落實溶滲式的教學方法。多年來教育部推動「科學、技術、社會融合」（STS）課程與思考導向教學，這是一個很正確的一個方向。台大從 95 年度開始，有些課程是每 25 個學生給予一位研究生教學助理來帶領討論，這是一個可能的執行方式。在這些調整之餘，我們還必須要導正學生與家長對待通識教育的態度。我們的學生、家長，基本上是把大學教育視為一種職前訓練。不僅是海峽兩岸華人社會普遍存在這種功利主義的教育觀，國外著名大學的校長也常常必須對家長們解釋，為什麼他們花那麼多的錢送小孩子進入頂尖大學，可是校方卻讓他讀一些像是柏拉圖、莎士比亞之類無關痛癢的課程。眾所週知，海峽兩岸社會的功利主義氛圍非常強烈，也因此，大學通識教育的執行者對學生與家長的態度也應該試圖加以導正。

## 肆、以通識教育落實文化傳承：教育理念與課程規劃

那麼，落實文化傳承的通識教育理念與課程規劃，應該如何進行？首先，我們要放眼於建構某種「全球化」時代跨文化脈絡的新人文主義。展望未來，我們可以研究一種「全球化」時代的新人文主義的可能性。這種新的人文主義不同於建立在啓蒙文明（Enlightenment）基礎之上的人文主義。在 21 世紀新人文主義裡，我們要注意自我（self）與他者（other）之前的互動與對話。「自我」若從與他人互動的脈絡脫逸出來，就會成為馬丁布伯（Martin Buber, 1878 – 1965）筆下孤伶伶的個人。<sup>11</sup>今年（2007）的四月十七日，韓裔學生趙承熙在維吉尼亞理工大學殺了 32 個學生以後舉槍自殺。他在筆記裡面留下了這樣的字句：「教我如何說話、教我如何分享、指引我該往哪裡去，告訴我哪兒有愛？」從這個悲劇性的個案，我們可以了解「自我」與「他者」的互動，實在是當代社會所必須注重的問題。

我們進一步分析「全球化」趨勢演變至今的狀況，就會發現所謂「全球化」已經成為各國具體狀況「之上」的一種抽象原理。作為抽象原理的「全球化」，就好像在此時此地「愛台灣」一詞作為一個至高無上神聖命令一樣，它很容易被少數人所宰制而成為一個壓制異己的工具。因此，新的人文主義必須建立在全球具體而特殊的脈絡「之中」，而非「之上」，並且採取牟宗三（1909 – 1995）先生所謂的「並立原則」，而不是「從屬原則」，作為運作的原理。<sup>12</sup>

第二個教育理念則是：讓我們的大學生習慣於**從亞洲出發思考**，使他們在二十一世紀文明對話的新時代中，更有紮實的基礎。「從東亞出發思考」對於我們整個亞洲的知識界與高等教育界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亞洲人從 19 世紀以後，在歐風美雨之下，習慣於從歐美出發思考問題，亞洲知識份子常常透過 CNN 建構他們的世界圖象，因此看不

<sup>11</sup> Martin Buber, *I and Thou*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8).

<sup>12</sup>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台北：學生書局，1990）。

到這個世界的不公不義，也看不到這個世界的黑暗面。亞洲的大學教育一定要幫助建立起「亞洲人的良心」。

在以上的理念之下，課程規劃應該如何進行呢？如前所述，二戰以後科技飛躍發展，科技與人之間的巨大落差整個地顛覆了大學結構。在這種狀態下，我們更應該強調一般文化素養課程。我們可以參考東京大學發展出的模式，東大學生入學後的頭兩年，必須先修習類似於通識部門的「教養學部」的諸多課程，然後才進入專業教育。

課程規劃的第二個原則是：因應「全球化」時代的新挑戰，為學生的未來預做準備。世界各國重點大學的課程規劃有各種模式，例如東京大學就要求學生必選兩種外國語言，而且必選電腦、生物等課程。但是這些技術層面的工作，像是兩種外語訓練、電腦知識培養等等，其實比較容易達成。我們更應將通識教育重心放在跨文化視野中「自我」與「他人」的互動。以「從東亞出發思考」為例，我們應該規劃諸如「東亞文化傳統與現代」之類的課程。

## 伍、結論

在以上論述的基礎之上，我們可以提出以下兩項結論。首先，大學的靈魂在於文化的傳承與弘揚。當前現狀下的大學可以說是一個有體無魂的教育機構。華人地區的大學院校基本上是資本主義社會中高科技廠商的研發工廠，甚至在某一些特定領域裡面，是新權力階級意識型態培養場所。展望未來，我們希望大學魂兮歸來。大學能召喚自我的靈魂，頂天立地、愛國愛人。

第二，展望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時代，我們應該秉持著「互為主體」的精神。不僅是人與人之間互為主體，人與自然、人與超自然之間亦應如是奠定價值基礎，建構一個適應「全球化」時代的新的人文主義精神，作為新時代的大學的理念，使大學成為培育知識份子良知的殿堂。

##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in the Global Era: Problems and Direction**

**Chun-chieh Huang<sup>\*</sup>**

###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roblems posed by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cultural role to be played by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in this global era. In the first section, we look at how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enhances the domination of the central, powerful countries over the marginal, weak ones, and all the way widens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section two, it is pointed out that globalization, along with the dazzling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have changed the structure and value of the college. In response to such a devouring trend, the college is supposed to disseminate certain universal values on the one hand, and reserve and promote traditional cultures on the other.

Section three proposes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college, as the vehicle for cultural values, to imbue all the professional disciplines with humanistic concerns, a way which aims to cultivate the youths' minds as the water down-penetrates. Section four further substantiates the idea of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and the design of courses. The article concludes in section five, with the ideal of reconstructing college as the taker of cultural responsibility.

**Keywords: globalization, the ideal of university, cultural inheritance, inter-subjectivity**

### 【作者簡介】

**黃俊傑簡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1965）及歷史研究所碩士（1973），美國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博士（1980）。曾任新加坡儒家倫理小組顧問（1985），美國華盛頓大學（1986-87）、馬利蘭大學（1995）、Rutgers 大學（1996）等校客座教授、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理事長（1996-2000）、名譽理事長（2005 起）、台灣聯合大學系統講座（2005）及東吳大學東吳通識講座教授（兼任，2005）。現任台大歷史系特聘教授，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台大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總主持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獲得學術榮譽有：美國王安漢學研究獎（1988）、傑出人才講座（1997-2002）、胡適紀念講座（2005-2006）。研究領域包括：東亞思想史、史學方法論、戰後台灣史，著有：《德川日本論語詮釋史論》（台大出版中心，2006）、*Taiwan in Transformation (1895 - 2005)*（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6）、《全球化時代大學通識教育的新挑戰》（2004）、《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2004）、《孟子思想的現代詮釋》（2002）、《大學通識教育探索：臺灣經驗與啟示》（2002）、*Mencian Hermeneutics: A History of Interpretations in China*（2001）、《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2000）、《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與實踐》（1999）、《戰後臺灣的轉型及其展望》（1995）、《孟子》（1993）、《孟學思想史論》（卷一）（1991）、（卷二）（1997）等書。

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 一卷三期